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论道终南

(2016—2017年卷)

朱锋刚 主编



Lundao Zhongn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论道终南

(2016—2017年卷)

朱锋刚 主编

Lundao Zhongn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道终南. 2016—2017年卷 / 朱锋刚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203-2406-9

I. ①论… II. ①朱…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514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韩国茹 郝玉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300千字
定价 7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论道终南编委会

(2016—2017 年卷)

主 任 吴建新 漆 思

委 员 (按姓氏拼音)

常 新 董永强 胡耀飞 江求流 李 军

李蕊芹 刘建伟 潘明娟 宋宽锋 王 珏

王 猛 王 伟 王新水 徐志宏 郁志强

张爱萍 赵常兴 赵卫国 朱锋刚 邹 贺

主 编 朱锋刚

编 辑 郁志强

序 言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获取知识途径越来越便捷、多样的时候，驻足静心的闲暇没有如期而至，反而显得有点奢侈。随着资本对于现代社会无孔不入地渗透，个体不管喜欢与否都在见证着“钱”的魔力，遭受其“效用至上”原则的驱使。曾在商业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名句，开始在知识生产等精神领域生效。时间成本与知识生产的效率问题就这么不期而遇。当人们在生产知识的过程中过度关注生产效率时，“目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往往会因与效率原则相抵牾而备受质疑。然而目的往往需要置于“道”的高度予以审视才能予以正确评价。给心灵留置一点闲暇以供思考就显得非常必要。

面对面的交流早已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互通信息的唯一途径。随着人类拓展生存空间能力的大大提升，即便交通工具的运输能力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身处不同地方的个体若想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是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克服空间所造成的隔阂。相较而言，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传递信息、实现沟通的方式所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既然面对面需要花大把时间才能将参与者聚在一起，因而除非必要，否则这种交流方式会因效率问题而遭嫌弃。

生产知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效率？显然不是。安顿立命，或许更接近答案。“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学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是避免固执己见、突破知识狭隘，寻求安身立命的有益方式。因此，人们往往不顾所谓的“效率”问题、克服困难一起切磋学问。有赖于信念与定力的支撑，才会有如此执着的行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这份执着正是基于对“道”的关切与觉解，正可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虽然整天在日新月异的器物世界中忙碌、牵挂、受制、享受，依然有那么一群人依然有份真切关注“道”的种子留存心田。甘雨降临，种子就会迸放出生命力量。“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周易·文言》）地处终南山脚下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师生以此为宗旨，成立“论道终南读书会”，潜心于学，定期聚集讲学、相互切磋，共勉前行。参与者不言艰辛，只为在求学问道的路上思考、探索生命的意义与世界的精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他院系师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兄弟院校同仁多方参与让讲学活动更加多元、丰富。读书会也期待、欢迎更多有志之士前来切磋学问、交流心得。

由于本书缘起于“论道终南读书会”，故取名为“论道终南”。《论道终南》丛书见证了“论道终南读书会”的成长与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参与、用心付出的心路历程。读书会的顺利开展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终南文化书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是为序。

朱锋刚

2017年4月于终南文化书院

目 录

哲学部分

- 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宋宽锋 (3)
- 康德道德主体的有限性内涵 赵卫国 (17)
- 身心之学的重建与自律道德的回归
——朱子的工夫论及其心性论基础 江求流 (31)
- 生活的彰显或消逝?
——试论“自媒体时代”生活之本质 徐志宏 (56)
- 六祖求法偈与“何期自性”偈的关系及《坛经》
心、性、佛三者之关系探析 王新水 (69)
- 身体与大地式的存在
——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一条线索 王 珏 (87)
- 《华严宗佛祖传》中伯亭续法之教观思想分析 张爱萍 (108)

历史部分

- 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 董永强 (133)
- “啸聚为盗”：王仙芝、黄巢集团成员考 胡耀飞 (147)
- 秦的圣都制度与都城体系 潘明娟 (194)
- 北门禁军与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之关系考辨
——以常何为中心的考察 李 军 (214)
- 中国梦历史文化内涵析论 邹 贺 (233)
- 历史研究的两个层面与历史存在的四种形态 张 玉 (246)

政治部分

- 社会转型时期城中村社会经济功能…………… 赵常兴 (261)
论新时期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 王 猛 (272)

文学部分

- 唐前关中文化嬗替与本土文学创作之阶段性 …… 王 伟 (283)
借鉴与反思：明清小说与道藏仙传关系
论略…………… 李蕊芹 许勇强 (294)

哲学部分

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哲学史 研究方法论^{*}

宋宽锋^{**}

摘要：当代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理论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造成两者之间相互脱节的深层学理根源之一就是，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出了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史家、哲学家，冯友兰和牟宗三集双重角色于一身的事实或许正好说明，他们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因而，回顾、反思和分享两位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对于增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识，促进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冯友兰；牟宗三；哲学史研究方法；哲学研究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理论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造成两者之间相互脱节的深层学理根源之一就是，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出了问题。^①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需要关注冯友兰和牟宗三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原因在于：一方面，自从1914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招收第一届学生至今，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和哲学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而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不限于中国哲学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资助，批准号：12XZX006。

** 作者简介：宋宽锋（1967—），陕西兴平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宋宽锋：《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人文杂志》2014年第11期，第1—6页。

史）贡献最大的当数冯友兰和牟宗三；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一个世纪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中国哲学家。他们集哲学史家与哲学家的双重角色于一身的事实，或许也会启发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他们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并没有相互脱节，而其学理根源就在于他们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我们有所不同。因而，回顾、反思和分享两位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对于我们增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识，进一步地思考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相互脱节的深层学理根源，从而实现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何兆武先生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段评论开始，可以展开对于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在出版于2006年的《上学记》中，何先生有以下回顾和点评：“胡适本人其实是个考据学家，他说自己有‘考据癖’，不过单纯的考据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以为北大哲学系受胡适的影响太大，走上考据的路，变成了哲学史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史并不等于哲学，就像数学史不是数学一样，北大哲学系的路数就成了以哲学史代替哲学。比如汤用彤本人的学问非常好，可他搞的主要是哲学史。冯友兰在清华教书，但他是北大出身的，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写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家各派；另外一种哲学家的写法，用哲学家自己的思想理解古人。冯先生属于后者。”^①

何先生的以上评论，主要提出了两个相关论点。首先，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不同。当然，说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也是无法反驳的。但是，承认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并不等于认为，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哲学史研究是不必要的，或者反过来，从事哲学

^①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5—266页。

史研究就一定会走上以哲学史代替哲学的道路。冯友兰的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冯友兰既是一个哲学史家，又是一个哲学家。对于冯友兰来说，不仅哲学史研究未曾导致代替哲学研究的后果，而且哲学史研究实际上还成为其哲学研究和哲学体系建构的基础。所以，北大哲学系之所以走上以哲学史代替哲学的道路，根本原因并不是它太过重视哲学史研究而忽视了哲学研究，甚或模糊了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差异，而是北大哲学系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出了问题，或者说，北大哲学系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那么为什么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没有产生代替哲学研究的后果，而北大哲学系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却走上了以哲学史代替哲学的道路呢？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关涉何先生在以上评论中所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即哲学史研究的两种方法的区分。何先生说，哲学史有两种写法，即历史学家的写法和哲学家的写法。当然，不用说，哲学史的两写法就是哲学史的两研究方式。另外，从何先生的以上评论，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哲学家的写法，而汤用彤和北大哲学系进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则是历史学家的写法。北大哲学系之所以会走上以哲学史代替哲学的道路，就是因为它以历史学家的写法来研究哲学史，而不是以哲学家的写法来研究哲学史。以历史学家的写法来研究哲学史，就会导致以哲学史研究代替哲学研究的后果，而以哲学家的写法来研究哲学史则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与何先生的以上评论相一致，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早期阶段，就提出了哲学史研究的两种方法的区分。在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的“序言”中，他说：“吾非历史家，此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①在应答胡适和张荫麟对其《中国哲学史》进行评论的文章中，冯友兰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并阐发了两种研究方式的不同特点。他说：“有历史家的哲学史，有哲学家的哲学史。历史家的哲学史注重‘谁是谁’。哲学家的哲学史注重‘什么是什么’。我是哲学家不是，尚是问题，不过我确不是历史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家。”^①不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虽然正如他所强调和承认的，乃是“哲学家的哲学史”，但是其中并非没有“历史家的哲学史”的成分，也并不排斥哲学史的“历史学家的写法”。因为正如他所说，他的《中国哲学史》只是更为注重“哲学”的方面而已，所以，在应答胡适和张荫麟对其《中国哲学史》的评论时，他进行了以下的补充说明：“一个《哲学史》所负的历史的任务，如素痴先生所说者，我的书也尽了不少。”^②

然而，“历史学家的写法”与“哲学家的写法”“历史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家的哲学史”“历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它们各自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区别何在，何兆武和冯友兰都未给出相对充分的说明。冯友兰说，“历史家的哲学史注重‘谁是谁’。哲学家的哲学史注重‘什么是什么’”。注释其含义可以理解为，“历史家的哲学史”注重对哲学家其人的了解和研究，而“哲学家的哲学史”注重对哲学家之“哲学”的研究。但是，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历史家的哲学史”绝不限于对哲学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家庭状况及其时代背景等的了解和研究，否则的话，它就只是“哲学家”的“历史”，而不成为“哲学史”了。“历史家的哲学史”也会研究哲学家的“哲学”，然而它更多的是通过历史地理解“哲学家”其人來理解其“哲学”的。与此相对应，“哲学家的哲学史”也并非就完全不关心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其人，而只是更为关注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的“哲学”，而关注对其“哲学”本身的研究。当然，以上的进一步解说，也还是不充分地。另外，何兆武关于哲学史的“哲学家的写法”的解释，即“用哲学家自己的思想理解古人”的说法，也是有待商榷的。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和深入地理解两种不同的哲学史或者其写法、研究方式的内涵、理路和特点，我们还需要进行更为广泛地探究。

在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评中，张荫麟曾对两种不同的哲学史或者其写法做出了说明，而在对张荫麟的书评的回应中，冯友兰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② 同上。

明显地默认了张荫麟的说法，因而我们也就把张荫麟的说法引证在这里。他说：“《哲学史》顾名而知其负有两种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系统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年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①

—

以上我们从两种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区分的角度，讨论了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而在随后发表于1937年的一篇专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论文中，冯友兰转而提出了六种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但却没有提及和讨论“历史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家的哲学史”及其区分。他所列举的六种哲学史研究方法如下：一，钻研西洋哲学；二，搜集哲学史料；三，详密规划迹团；四，探索时代背景；五，审查哲人身世；六，评述哲人之哲学。^②冯友兰所说的第一种方法，即便在今天，也还有其特殊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不过此处我们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另外，不难看出，冯友兰所提出的第二、三、四、五种方法，大致说来，都可以被归类在“历史家的哲学史”或者“历史学家的写法”之下，而唯独第六种方法大致与“哲学家的哲学史”或“哲学家的写法”相对应。同时，与早前的看法相一致，冯友兰还是更为注重这里所说的第六种方法，他说：“我们以为评述哲人的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首要方法。”^③

冯友兰对第二、三、四、五种方法的论述较为充分，其论点也较易于理解。总的来说，这一系列方法的运用，就是通过把哲人之哲学重新

^① 张荫麟：《评〈中国哲学史〉上卷》，《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置于其所产生的历史情景之中，并且借助其历史背景、生活经历、身世和心路历程，来历史地理解和解释哲人之哲学。再则，就其特点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一系列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简称为“史的方法”，而将与此对应的哲学史研究阶段简称为“史”的阶段。至于“评述哲人之哲学”的第六种方法，在论文中，冯友兰又进一步地将其区分为前后相继的四个步骤：第一，搜寻哲人的哲学之来源；第二，把握哲人的哲学之体系；第三，指出哲人的哲学之影响；第四，评判哲人的哲学之得失。^①而在我们看来，以上四个步骤之中的第一、第三步骤，大致可以被归并在第二步骤之中，因为对哲人之哲学的思想渊源和思想效应的研究，都是从属和服务于对哲人之哲学的解读的。这样一来，冯友兰所说的四个步骤就可以被归并为两个步骤，即对哲人之哲学的“述”和“评”。对于“述”的步骤，冯友兰特别强调要充分展现哲人之哲学的体系性，也就是说，要充分地展现其哲学分析问题的思路及其论证和思想的结构。无疑，冯友兰强调这一点的合理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哲人之“哲学”绝不会是一些凌乱的观点或想法的堆积，而一定是相当程度上具有其内在理论和思想逻辑的一系列观点之统一。另外，“述”之环节的根本目的，在于对哲人之哲学体系的“客观呈现”，即冯友兰所说“原原本本，实实在在”的呈现。至于“评”的环节，冯友兰所论甚详，不妨摘录如下：“批判哲人的哲学之得失，有两种方法：一是在他自己的系统内批判他自己的得失，其标准是该哲学所采的论证，是否矛盾？有无谬误？能否说通？能说通则有价值，不能说通则无价值；一是在他自己的系统外批评他自己的得失，其标准是该哲学所得的结论，是否契合于他所解释的客观事实，契合则有价值，不契合则无价值。”^②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冯友兰所说的六种哲学史研究方法分别归并在哲学史研究的三个环节，即“史”“述”“评”三个阶段。而如果这一哲学史研究的三阶段及其对应的研究方法之区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接下来需要追问和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三个阶段及其对应的研究方法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一问题，冯友兰并未给出明确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411页。

② 同上书，第411页。

而系统的说法，因而我们还需要进行引申性的追问和探究。

在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冯友兰在讨论“史料”的真伪问题的时候，所讲的以下这段话，特别值得玩味。他说：“吾人研究哲学史，对于史料所以必须分别真伪者，以非如此不能见各时代思想之真面目也。如只为研究哲学起见，则吾人只注重某书中所说之话之本身是否不错。至于此话果系何人所说，果系何时代所有，则丝毫不关重要。某书虽伪，并不以其为伪而失其价值，如其本有价值。某书虽真，并不以其为真而有价值，如其本无价值。”^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分辨史料之真伪，确定史料产生的实际年代，厘清各时代思想的真面目，大致都属于以上所说的哲学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即“史”的阶段；这个阶段所对应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就是以上所说的“史的方法”。另外，从我们引证的冯友兰的这段话中，还可以合理地推断，“史”的阶段与“述”和“评”的阶段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关联，“史的方法”与“述”和“评”的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哲人之“哲学”本身的内在思想结构、理路和论证的系统把握和呈现，还是对哲人之“哲学”的理论得失之评价，正如冯先生所说的那样，都与表现哲人之“哲学”的著述或史料的时代，以及哲人本身及其生活经历等没有本质性的关联。

我们知道，哲人之“哲学”表述在其著述之中，或者说，哲人的著作是其“哲学”的体现。我们可以把哲人的著述或著作称之为“哲学的文本”。我们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表述在“哲学的文本”之中的“哲学”，但是“史”“述”“评”三个阶段各自的研究方法却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在“史”的研究阶段，我们主要是通过“哲学的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生活于特定历史情景中的哲学家其人，来理解和阐述“哲学的文本”之中的哲学思想。这里我们想强调指出的是，相对于“哲学的文本”而言，相应的时代背景和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情景之中的“哲学家”本人都是“外在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把“史”的阶段的研究方法称为“外缘的解释”^②。而如果说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2—356页。